



曲 枫 | 主编

唐 戈 | 本期特约主编

[德] 迈克·克努佩尔 | 副主编

赵立霞 | 执行主编

北冰洋研究

第七辑



Journal of Arctic Studies

上海三联书店



曲 枫 | 主编

唐 戈 | 本期特约主编

[德] 迈克·克努佩尔 | 副主编

赵立霞 | 执行主编

北冰洋研究

第七辑



Journal of Arctic Studies



上海三联书店

目 录

卷首语

呼伦贝尔的特点和国际化	唐 戈 /1
Preface	Michael Knüppel / 9

呼伦贝尔与区域研究

西北满洲——根据沿途考察资料所作的地理学概述	[俄] 希罗科戈罗娃 (张 松 时 妍译) /3
西北“满洲”和使鹿通古斯——于 1930 年 4 月 7 日晚间学会会议上宣读	[英] E. J. 林德格尔 (王 佳译) /15
北极圈民族和文化研究的定位问题之拙见	白 兰 /38
呼伦贝尔：区域概念与区域研究的构想	唐 戈 /46
本体论、族群互动与小民族——试论作为方法的鄂伦春	张雨男 /58

历史与文化变迁

搬迁：文化演变的枢纽——近半个多世纪使鹿鄂温克生活历程	何 群 /71
呼伦贝尔地区八旗制度的建立及传统社会的结构性变迁	王 伟 /87
略论乾隆朝布特哈八旗的贡貂制度	姜永军 王学勤 /98

经济与生计方式

通古斯鄂温克人“定居游牧”生产模式的形成与现状	李·蒙赫达赉 /111
鄂温克族自治旗文旅产业创新发展研究	刘晓春 乌日乌特 /124
场景理论视角下的牧区小镇经济发展——以阿木古朗镇特色产业为例	唯 日 /136

农牧经纪人——呼伦贝尔草原“老客”研究 殷汝帅 /145

边界研究

俄中边境锡尼河布里亚特传统文化 [俄] 米哈廖夫·

马克西姆·谢尔盖耶维奇（齐山德译）/161

中俄口岸“打包商”：一个迁移群体的社会网络与商业实践

——基于满洲里的田野调查 孙晓晨 /171

民间文本与宗教传统

岩画与通古斯人的宗教神话传统

..... [俄] A.П. 扎比亚科（王俊铮译）/185

中国三河流域俄罗斯族的旁注民俗文本——艺术民俗志资料

..... [俄] 扎比亚科·安娜·安娜托利耶夫娜（王宇琦译）/195

内蒙古三河流域俄罗斯族民间文化——“旧”歌概况 张如阳 /213

前沿观察

在过渡边疆重建当地社区：库玛尔路的管理和社会组织——从1900年到1940年

..... [美] 金由美 曾健欣 /228

书评

俄罗斯“遗失的文化天堂”——评柯廖斯的《三河地区的俄罗斯文化

——民间文学与传统文化论集》..... 唐 戈 梁 喆 /299

学术动态

黑龙江省鄂温克族研究会 涂亚君 /309

征稿启事

《北冰洋研究》征稿启事 / 314

Call for Submissions: *Journal of Arctic Studies* / 315

CONTENTS

Preface

Features and Internationalisation of Hulun Buir	Tang Ge/ 1
Preface	Michael Knüppel/ 9

Hulun Buir and Regional Studies

Northwest Manchuria — Geographical Overview Based on the Data along the Way	Елизавета Николаевна Широкогорова (Translated by Zhang Song & Shi Yan) / 3
Northwest “Manchuria” and the Lulu Tunguska—Read at the Evening Meeting of the Society on April 7, 1930	Ethel John Lindgren (Translated by Wang Jia) / 15
The Opinion on the Positioning of Arctic Circle Ethnic and Cultural Studies	Bai Lan / 38
Hulunbuir: Concept of Region and Conception of Region Study ...	Tang Ge / 46
Ontology, Ethnic Interaction and Small Ethnic Group: Orochen as Method	Zhang Yunan / 58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hanges

Relocation: the Hub of Cultural Evolution — The Way of Life of Reindeer Ewenki in the Recent Half Century	He Qun / 71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Eight Banners System and the Structural Change of the Traditional Society in Hulunbuir Area	Wang Wei / 87
On the Tribute Mink System of Butha Eight Banners during Qing Dynasty	Jiang Yongjun & Wang Xueqin / 98

Economy and Ways of Livelihood

The Status Quo and Formation of “Settled Nomadic” Production Methods of the Ewenki People	Bo • Menghedalai / 111
--	------------------------

4 北冰洋研究（第七辑）

- Research on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al and Tourism Industries
in Ewenki Autonomous Banner Liu Xiaochun Wuriwute / 124
-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Pastoral Tow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cene
Theory Wei Ri / 136
- Brokers between Agriculture and Animal Husbandry — 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Hulunbuir Grassland Cattle Dealer Yin Rushuai / 145

Boundary Crossing

- Strategies of the Shenehen Buryats in the Context of Russian-Chinese Border
..... Maxim S. Mikhalev /(Translated by Qi Shande) / 161
- “Packaging-businessman” at the Manzhouli Port—the Social Network and
Border Trade Activities of Migrant Groups Sun Xiaochen / 171

Folk Texts and Religious Traditions

- Petroglyphs and the Religious Mythological Tradition of the Tungus
..... Andrey P. Zabiako (Translated by Wang Junzheng) / 185
- Literary Ethnography: the Problem of Explication from Marginal Folklore Texts
of Russian Descendants in the Sanhe
A. Zabiako (Translated by Wang Yuqi) / 195
- Russian Folk Culture in Trekhrechiye (Three Rivers, Sanhe), Inner Mongolia
— Overview of “Old” Songs Zhang Ruyang / 213

Frontier Observation

- Reconstructing Local Communities in Transitional Borderlands: Governance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Kumar Route, 1900—1940
Loretta E. Kim & Monica Kin-ian Chang / 228

Book Review

- Russia’s “Lost Cultural Paradise” Comments on Kolyos’s “Russian Culture in
the Sanhe Region: A Collection of Folk Literature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 Tang Ge & Liang Zhe / 299

Academic Events

- Ewenki Research Association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Tu Yajun / 309

Call for Submissions

- Call for Submissions: *Journal of Arctic Studies* (Chinese) /314
- Call for Submissions: *Journal of Arctic Studies* /315

历史与文化变迁

搬迁：文化演变的枢纽

——近半个多世纪使鹿鄂温克生活历程

何 群

摘要：狩猎文化较之农耕文化较为核心的差别即居无定所。“搬迁”作为狩猎生计的中心环节、关键事件，构成其文化维持、演化的枢纽。“搬”的动因、形态，当属自然环境与狩猎生计关系范畴，而一些情况下也会超出这个范畴。我国大兴安岭西北地区传统狩猎、使鹿鄂温克群体近半个多世纪几次大的搬迁、定居经历表明：因搬迁原因来自外部力量，搬迁原因均已超出狩猎、使鹿文化与自然环境关系、生计模式等原初内涵。其意义、范畴，显然已超乎寻常地发生溢出，传统狩猎、使鹿群体的互动对象亦变得多元。或者说，由过去经常性的与山林、动植物、气候等自然因素的互动、协调，转变为事实上依然受制于自然环境因素、经常性的与人、社会等人文因素的互动与协调。

关键词：搬迁 枢纽 文化演变 使鹿鄂温克

作者简介：何群，呼伦贝尔学院客座教授，内蒙古师范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为人类学。

考察中国东北大兴安岭西北坡冻土地带传统狩猎、使鹿鄂温克近半个多世纪史，可以发现，“搬迁”呈现为统领该群体社会、文化演变的中心环节和关键线索。从1957年定居奇乾，到1965年内迁至激流河畔敖鲁古雅，再到2003年8月生态移民至根河市郊“新敖乡”，3次搬迁构成该群体鲜活的生命轨迹和生活史。每次定居、搬迁之后，自然条件以及外部社会背景——环境，

均发生程度不同的改变，伴随引起该群体程度不同的文化、社会转变。对此，有不少珍贵而翔实的记载；与此同时，似乎存在另一种启发：1957年、1965年的定居、搬迁，与2003年8月的搬迁——“生态移民”，既存在多种联系，也隐含一些差异。这一点，集中体现于自然环境、社会文化背景、起因以及带来的文化变化。尽管上述搬迁原因均已超出狩猎、使鹿文化与自然环境关系、生计模式等原初内涵。

狩猎文化较之农耕文化较为核心的差别即居无定所，搬迁构成其文化维持、演化的枢纽。“搬”的动因、形态，当归为自然环境与狩猎、使鹿文化关系范畴。使鹿鄂温克近半个多世纪几次大的搬迁、定居经历表明：因搬迁原因来自外部力量，尽管自然环境与狩猎、驯鹿文化关系依然作为文化变迁形态底色，即依然没有完全离开那片山林、冻土、苔藓，尽管大致于2003年前后已经停止狩猎，将以往与狩猎生计并存的驯鹿饲养作为主业，并伴随政府倡导、组织而参与旅游业等新兴产业。总体而言，来自外部力量引发的搬迁，其意义、范畴，显然已超乎寻常地发生溢出，传统狩猎、使鹿群体的互动对象亦变得多元。或者说，由过去经常性的与山林、动植物、气候等自然因素互动、协调，转变为经常性的与人、社会等人文因素的互动与协调。

一、传统时代的定居，搬迁——1957年定居奇乾、1965年搬迁敖鲁古雅

在今日敖乡，依然不难听到村民随时会谈到奇乾、满归、老敖乡这样一些字眼，如同随时会谈起驯鹿、打猎。奇乾是中俄界河——额尔古纳河右岸一微型聚落，最早是中俄商人在此进行交易的类似小集市的所在。传统狩猎、饲养驯鹿的使鹿鄂温克人于1957年最早由政府组织在此尝试盖房、定居。从奇乾向周边扩散，便是使鹿鄂温克猎民的猎场和驯鹿活动的天下。1965年使鹿猎民村搬迁至敖鲁古雅后，奇乾日渐衰败，目前散落着几座文物般猎人留下的旧屋。“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使鹿鄂温克人和全国各族人一样成为新中国的主人，进入了政治上平等，经济上发展的新时期。党和政府在政治上关怀他们，生活上关心他们，生产上帮助他们，并采取一系列政策和措施：首先从改进生产工具入手。枪支是猎民的生产工具，政府为了支持猎民的狩猎生产，把日伪时期用的‘三八’和‘九九’步枪换成了我国造的‘七九’步枪，并供应子弹，以后又换用了仿造的‘七六二’步枪，

还为了便于猎取灰鼠、飞龙、松鸡等小猎物配备了小口径步枪，以便增加猎业收入。”（吴守贵 2008：408）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保护猎民利益，政府及时于 1949 年在奇乾成立供销社，实行以公平合理的价格与猎民进行交易。根据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于 1957 年在奇乾成立民族乡政府，积极推进文化、教育、卫生等各项社会事业建设。

“民族乡成立后，党和政府就考虑过猎民的定居问题，国家拨款在乌启罗夫盖起过 33 座木刻楞定居房，由于受狩猎和放牧驯鹿的牵制，多数人仍然在山上游居，只有少数人下山暂住，猎民们长时间上山放养驯鹿和狩猎，短时间在定居点生活，定居与狩猎和牧鹿有了矛盾，而形成了‘定而不居’的局面。”（吴守贵 2008：408—409）“……猎民虽然都分得了定居房屋，但由于受狩猎与饲养驯鹿的约束，猎民离不开山林，下山居住的很少，房屋多为空闲，只有几家鄂温克族干部职工在乡里长期居住。”（孟和 2010：277）上述记述表明，自 1957 年建乡、组织实施定居之初，便出现定而未居、山上山下格局。原因在于定居与游猎、使用驯鹿生产、生活方式的截然对立。尤其是驯鹿作为半野生动物不适合圈养等自然习性。猎民们长时间上山放养驯鹿和狩猎，短时间在定居点生活，定居与狩猎和牧鹿有了矛盾，而形成了“定而不居”的局面。“后来，随着大兴安岭林区的开发，铁路向原始森林腹地的延伸，地方政府为了管理相继成立的林区新兴城镇……。由于行政区划的变更，加上激流河流域森林的开发，民族乡的工作中心逐渐向交通方便的阿龙山方向转移时，1964 年 10 月，在奇乾发生了‘吉米德不幸死亡’事件。”（孟和 2010：30—31）“在平息‘吉米德事件’后，工作队在阿龙山召集乡干部和猎民代表参加的座谈会，征求猎民定居的意见。大家一致同意把猎民定居点建在森林腹地、苔藓丰盛、狩猎与养鹿活动中心——敖鲁古雅河口处。敖鲁古雅河周围是猎场，苔藓也随处可见，又距离铁路满归站 17 公里，还有运材路，交通方便，猎民满意。工作队立即进行规划和设计，在盟、旗两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视与领导下，1965 年 4 月动工，在满归建砖瓦结构的乡政府办公室，在敖鲁古雅河口建 35 座木刻楞结构的猎民住宅。当年 9 月落成，每户猎民都分得一座新的木刻楞定居房屋，并在敖鲁古雅召开各‘乌力楞’猎民都下山来参加的定居点落成大会。”（吴守贵 2008：410—411）此处揭示了 1965 年搬迁至敖鲁古雅三大主要原因：林区开发，铁路深入森林腹地，铁路沿线出现新兴城镇——林场、车站以及沿铁路线进入的盲目流动人口形成的盲流屯等社区。铁路经过处，交通方便，也有利于民族乡各项行政工作开展。同时，伴随森

林开发，开发比较早的地带，是当时发展快的地区。所以，当时民族乡工作中心正在向阿龙山一带转移。据记载：“1964年，额左旗在阿龙山为猎民建筑一栋猎民招待所和一所民族小学。猎民招待所是一物多用的建筑，既是猎民下山食宿的招待所，也是小学生的宿舍和食堂。供销社的收购供应站也设在招待所里……。根据猎民要求采取的这项措施，实际上将奇乾鄂温克民族乡一分为二，同时也预示着民族乡政府从额尔古纳河畔迁往贝尔茨河方向的前奏”（孟和 2010：30）。另外，与奇乾一河之隔即是前苏联，当时中苏关系日益紧张，而使鹿群体又属于中苏跨境民族，苏联境内还有不少亲戚、朋友，关系密切。地理、文化、政治上存在的联系，以及“吉米德事件”^①作为直接导火索，均使搬迁势在必行。“1965年，是不平凡的一年，鄂温克猎民人口增加到166人，驯鹿发展到956头，又在理想的敖鲁古雅河畔实现了定居。从此，使鹿鄂温克人结束了数千年来的漂泊不定的游猎生活的历史，是在经济和社会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也是猎民在生产、生活方式上的一个转折点。但是从他们的狩猎与养鹿相结合经济特点来看，是‘相对定居’不是‘绝对定居’，只能说在生产、生活方式上进入了一个社区形式的‘定居行猎’和‘定居牧鹿’的新阶段。猎民中的老人、妇女、小孩住在固定房屋，猎手可以近猎也可以远猎，把驯鹿仍放养在山野里自己寻苔觅食。这不仅生产、生活两不误，也改善了猎民的生活条件。随着猎民的定居，民族乡政府当年也从奇乾搬到满归镇，改名为满归鄂温克民族乡。1973年，实行乡镇分设的行政管理，民族乡政府迁到距离满归镇17.5公里的敖鲁古雅河畔，改名为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孟和 2010：411—412）此时，凡是使鹿鄂温克人均为“猎民”，尚未出现40年之后——2003年8月生态移民“谁是猎民”难题。这一难题缘起于搬迁房以及新猎民社区住户，不包括使鹿人中干部、职工家

① 就“吉米德事件”，据研究：“1964年6月，昆德·伊万去根河赴任副旗长职务，尼格来乡长在阿龙山主持工作，留下副乡长吉米德在奇乾主持工作。10月末，正逢额尔古纳河开始封冻，奇乾中断了对外交通，一名猎民的女儿患急性阑尾炎，当地不能做手术，要求上级派直升飞机接患儿抢救治疗。直升飞机到达的前一天晚上，乡其他领导人研究如何迎接直升飞机的事宜，未通知吉米德副乡长参加，引起吉米德不满，与他们发生口角。于是，吉米德与派出所所长动手厮打起来，所长手枪走火，吉米德中弹身亡。吉米德不幸死亡事件引起了猎民思想波动。盟里为了稳定猎民思想情绪平息‘吉米德事件’，组织猎区工作队，深入猎区进行说服解释工作，稳定了猎民的思想情绪，使‘吉米德事件’平息下来。”（参见孟和著《使用驯鹿的鄂温克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0年12月，第30—31页。）

庭。这些人及家庭政府给一定补助，自行到根河市等租房、买房居住。这种安排，拆解、撕裂了老敖乡社区，民族内部分化、多民族社区关系分解，成为伴随生态移民的当地社会纷扰之一。上述记述还表明，1965年搬迁、定居敖乡初期，因自然条件、社会文化环境与奇乾时差异不突出，也没有发生后来重大的社会动荡、变化冲击诸如“文革”浩劫、人口流动——一些猎民年轻人、子女出去读书、工作以及其中有人因多种原因又返回敖乡狩猎、饲养驯鹿等现象和问题。1965年搬迁到敖鲁古雅，是猎民赞同的，感到山上、山下生活两不误并有所改善。应该认为，搬迁的成效较好，初期的确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既有安排经历各种因素作用，显示出让政府和猎民均意料不到的变化和问题。如与奇乾地理、交通条件不同，敖乡比邻铁路、公路较为便利的满归等地，以及林业开发等现代事业推进，林中人口日渐增多，偷猎、驯鹿活动空间变小成为问题。现代学校教育推广，年轻人观念、就业等选择变得多样，对驯鹿、猎民点情感似乎也开始有别于长辈。然而，若与2003年搬迁至根河市郊比较，1965年搬迁敖鲁古雅初期以及后来，社会、文化发生震荡程度要小，甚至不可比。如没有发生因驯鹿圈养后病死而重返森林大起大落。

搬迁地址的选择、确定，与传统狩猎、驯鹿生计事关重大。事实上，在1965年使鹿鄂温克主要以狩猎作为主要生活来源，驯鹿主要是充当托运工具及在宗教仪式、婚礼等习俗中扮演特有角色。问题是，不仅狩猎需要森林环境并地广人稀，驯鹿生存还有其特殊的对自然条件的要求，即生长有苔藓等冻土带森林地区，而全年平均气温零下5.3摄氏度、作为北极生态圈泰加林带南缘的大兴安岭西北坡能够满足驯鹿生存条件（丁铭等2022）。猎人、狩猎、驯鹿、苔藓，都意味着政府组织的搬迁，不能忽略对适合其传统生计方式一定程度的维系所需自然条件的考虑。1965年从奇乾搬迁敖鲁古雅，当地领导和政府对此给予高度重视。有人回忆道：“1965年初按内蒙党委指示，呼盟党委组织了一支猎区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我们是1965年2月份进入林区的，首先在阿龙山召开了猎民大会，猎民大会上讨论了在敖鲁古雅建立猎民定居点的问题，大家认为敖鲁古雅这个地点比较合适。工作队派我和猎民老玛嘎拉前去察看地形，当时察看的结果认为这个地址比较好，很平整，靠近激流河，建猎民村很理想。……。（涂荣1995：317—318）”工作队撤出后，我们主要抓了猎民定居点的巩固，重点进行猎民的思想教育，引导他们怎样改变落后的生活方式，怎样在新建的木刻楞房子里烧炉子、做饭。经过

一段时间的工作,猎民们的生活基本稳定下来,开始适应定居和季节性游猎的生产生活。当时我们有针对性地抓了文化教育、酗酒危害的教育、包括结核病的防治工作。”(涂荣 1995: 317—318)“……我们找到一些代表人物,选了定居点地址。当时昆德伊万是副旗长,尼格来是乡长,他俩同意在敖鲁古雅兴建定居点,但他俩同意不行,还要征得各部落认同。我们找到一些代表人物开会,实地考察,最后选定位于满归林业局附近的敖鲁古雅为定居点。”(卓利格图 1995: 126)“为了选择好定居点,猎区工作队专门召开座谈会,吸收有代表性的人士参加,经过反复比较和酝酿,大家一致选定在敖鲁古雅中国地方建定居点。当时有三个理由:一是交通比较方便,距离牙林线铁路终点站满归才 17.5 公里;二是 4 个猎民点中有 3 个点离敖鲁古雅较近,只有阿巴河的远些;三是环境优美,山清水秀……,长期生活在深山老林中的民族,免疫力比较低下,容易感染疾病。所以,在定居点的选择上环境对鄂温克族猎民的健康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卓利格图 2004: 80)

就从奇乾搬迁到敖鲁古雅的起因、过程另有记述:“为了改变鄂温克猎人长期动荡不定的游猎生活,有利于开展多种经营和发展文化卫生事业,1960 年由国家投资在奇乾为鄂温克猎民建 33 座木刻楞定居房屋。冬季老弱病残者住在定居点,学生上学老人陪伴居住,猎民下山也有暂住的房屋。但是,由于受狩猎和放牧驯鹿的牵制,多数人仍然在山上游居,只有少数人才能下山定居。当时奇乾不通公路,夏季从额尔古纳河逆水拉纤行船,4 天到吉拉林(室韦),再从吉拉林乘车到三河和海拉尔,冬季从额尔古纳河冰面跑爬犁 3 天到吉拉林。初冬封河期与春季开河期,均对外交通断绝一个多月时间,交通非常不方便,一旦出现紧急事务,确实无法解决。鉴于这种情况,设想将鄂温克民族乡政府从额尔古纳河边交通闭塞的奇乾迁出到交通方便的贝尔茨河这边来。……此次定居人数比 1961^①年在奇乾定居人数明显增多,老年人、猎民定居点建在各部落游猎的中心敖鲁古雅河口,是因为满归与敖鲁古雅地处森林腹地,地理环境更接近猎民的游猎与牧养驯鹿的生产生活方式,符合了猎民的心愿,所以被猎民接受,事情办得比较成功和顺利。”(孟和 2010: 32)从维护传统狩猎、驯鹿文化看,比较 2003 年 8 月生态移民,前期已经有一定平稳过渡,如因居于各猎民点中心,便于交流和狩猎;在介于奇乾、敖鲁古雅中间地段的阿龙山已建有囊括学校、贸易、政府办事等社会功能的猎

① 应为 1957 年,笔者注。

民招待所。大家心理上、社会舆论、意向上形成搬迁取向、态势。只是新定居点“交通方便”意味着社会人文环境将会变得越复杂，并一定程度埋下影响“变化”的伏笔。从宏观线索看，敖乡 38 年（1965～2002 年），到 20 世纪 70 年代，因环境变化与传统生计互动，狩猎收入锐减，驯养驯鹿以鹿茸获得收入成为主流，狩猎业转为驯鹿饲养以及其他副业如木材加工业出现。这一时期出现并大致完成从以狩猎为主转向以饲养驯鹿为主；这一时期，随着机关单位、学校以及社区行业划分，使鹿群体人口职业、行业分化加剧，如担任干部、职工者增多，开始占据人口相当比例。尽管这些干部、职工与本民族社会多存在密切联系；甚至上溯 300 多年前自俄罗斯西伯利亚迁移至中国大兴安岭西北部，使鹿鄂温克群体似从未缺乏与异族人交流机遇。这体现于宗教信仰、语言、生活方式较为多元等方面。而随着文化、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等敖鲁古雅社区全面完善和繁荣，特别是与奇乾时期社会文化环境多有差异，森林开发、铁路兴建带来的林场、车站等各种崭新社区、社会，以及沿铁路、公路线流入的盲目流动人口。在众多影响和交流中，与此形成某种对应，使鹿群体人口少并按照习惯法氏族内禁止通婚。凡此，均促成异族通婚日渐增多。

二、2003 年搬迁、生态移民——使鹿人、驯鹿生存环境发生根本变化

2003 年 8 月，使鹿鄂温克再次搬迁。与前两次搬迁多有不同，这次搬迁，使鹿鄂温克人、驯鹿的生存环境，均发生根本变化。这次搬迁主要来自敖鲁古雅——老敖乡地理、基础设施状况等与此有关的多重因素。提炼有关研究、当地社会大体共识以及笔者实地了解^①，所反映出的问题大体如下：地理、自然环境中，乡址处在山的北坡，地势低洼，是激流河、敖鲁古雅河交汇的三角林源地带。尤其是激流河水每年不断地冲刷居住之岸，迫使敬老院不得不搬家。大兴安岭的阴坡，地下大多有永冻层，因建设施工永冻层被破坏，楼房地基下沉，楼体开裂。要想改变这种环境，需要大量投入。如修一河堤，初步计划就要 600 多万元；从生产方式上看，猎民逐渐由打猎

^① 2000 年 7 月、2003 年 9—10 月、2010 年 11 月、2013 年 7 月、2021 年 6 月等，笔者多次赴根河、敖乡实地调查，就其文化变迁进行持续性观察。

为主，转向饲养驯鹿为主。驯鹿经济成为使鹿部主要经济来源。现在饲养驯鹿沿袭古老的放牧方式，鹿走搬家，猎民在山上生活十分艰苦，必须走人定居鹿舍饲的道路。猎民在乡里虽有房屋，但当初这些房屋都是小家碧玉式的建筑，无大院落，鹿无法舍饲，如果辟鹿舍仍需大量资金；敖乡高压输电线路老化，亟须改造，需要大量基金投入；敖乡专业人才缺乏及使鹿子弟就业安排等诸多问题急需解决；从生活条件上看，建乡时猎民的交通工具还是以驯鹿为主，没有自行车、摩托车、汽车，道路窄、直弯多，交通十分不便。随着经济的发展，各行各业讲效益，农行办事处在敖乡的营业部因每年亏损两三万元，无法维持，只好撤销。该乡远离经济较活跃的满归镇，到乡里旅游、参观、检查的人吃用的东西必须用汽车到远离 17 公里的满归集镇上去买，给乡里加重了负担，给客人带来了不便。至于每个家庭的日常用品，过去有民贸公司，现已破产，也只能到满归去买。因为人数有限的敖鲁古雅乡社区不太可能形成商品集散地，自给自足又没有这个条件，只能依靠外地解决吃、穿、用、戴。从为猎民营地服务上看，猎民营地最远在黑龙江漠河县境内，最近的也在 28 公里以外，平均在 50 公里以上，远离营地，后勤供应困难；从教育上看，学生不足百人，教职员工 20 多人，造成师资浪费，班次过小，不利于对学生的教育。学校部分校舍属于危房，底层砖粉化严重。从医疗条件上看，医院规模小，条件差，只能治疗头痛感冒等一些小病，人员、经费都是困难（孔繁志 2002：104）。

毫无疑问，老敖乡生态移民的确势在必行。原因不仅在于自然环境带来的房屋、道路等等问题，还有当年所具有的兼顾狩猎、驯鹿饲养而选择的猎民社会上下普遍看好的自然环境，却已经使驯鹿群体及地方社会发展感到诸多不便。而冻土带因开发、建筑施工等发生融解从而影响地面建筑安全，是不可逆转的。从这一点看，属于比较典型的生态危机。而就生态移民的必要性和意义，占主流的观点认为这是使鹿社会在迈向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相结合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敖乡各项事业有了很大发展。但由于长期从事狩猎和养鹿相结合的经济，始终没有走出森林，乡政府所在地虽然距铁路满归站 17 公里，但还是处在森林腹地自然环境中，在某种程度上制约着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加上森林的大量采伐，野生动物急剧减少，猎民猎获无几，养鹿售茸逐渐成为使鹿鄂温克人的主要产业（吴守贵 2008：415）。

三、使鹿社会等各方感受到的主要问题

生态移民前后，当地政府为猎民得以在新居住地——“新敖乡”^①安居乐业，做出细致周到的努力。据2013年根河市人大就搬迁十年之后使鹿鄂温克发展状况组织的调研，“搬迁来到根河市郊，敖鲁古雅鄂温克人住上了新居，生活条件和基础设施得到很大改善，猎民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改变，由起初的情绪波动逐渐适应了这里的生活。现在的鄂温克猎民的生活不仅仅在住房方面有了很大改善，最重要的是猎民思想观念的变化和生产方式的转变。很多家庭搞起了驯鹿产品小商店，并在政府的扶持下开展了家庭游，顺应了旅游形势的发展。鄂温克族儿童从出生后就参加医保，目前医保政策已经全面覆盖，而且在山上从事放牧驯鹿的和在山下没有职业的鄂温克族100%享受民政低保政策。鄂温克猎民在山下有舒适的别墅式住房，在山里每个猎民点有保暖的越冬板房和棉帐篷，使用上了太阳能照明和发电，安装有卫星接收设备。乡政府也极力调动猎民的积极性，鼓励猎民自主选择市场，自主销售驯鹿茸，对加工和销售确有困难的猎民点乡政府组织人力帮助猎民割锯驯鹿茸，使猎民真正感觉到党和政府的温暖照顾。现在驯鹿每年能产驯鹿鲜茸500公斤左右。在割锯驯鹿茸方面，乡政府对个别猎民点仍在帮助和扶持，并帮助联系客户进行销售。2005年加工后的干驯鹿茸的每公斤500元，而今各猎民点的驯鹿茸不再加工，鲜茸价格在每公斤1000元左右。有的猎民点在接待国内外旅游人员时可供游客自主选择驯鹿茸，其销售价格偶尔会更高。政策扶持项目的实施：在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和根河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敖乡因地制宜、因族举措，不断加大猎民扶贫工作力度，相继实施了千村扶贫工程、人口较少民族扶贫开发试点村和整村推进等扶贫工程，敖乡党委、政府积极组织编制实施了《敖鲁古雅鄂温克族乡推进农牧业产业化发展规划》和《鄂温克猎民家庭游发展规划》以及《敖乡整村推进直接扶贫到户实施方案》等5个扶贫规划，2003年以来敖乡共实施了‘千村扶贫养殖北极狐项目’‘较少民族扶贫开发呼伦贝尔肉羊养殖项目’‘较少民族扶贫开发驯鹿养殖项目’和驯鹿产品深加工‘产业化扶贫项目’以及‘整村推进扶贫项

^① “新敖乡”，是本地及外地人对生态移民后新址、新社区的俗称，也有称为“三车间”，新址是早期曾为林业部门一个木材存放、加工地——“三车间”。

目’等5个扶贫项目，通过扶贫项目的实施，提高了猎民的人均纯收入，加大改善猎民生产生活条件力度，在改善山上猎民生产生活方面，积极争取上级支持，购置了车辆，解决了猎民上山难的问题，为每个猎民驯鹿放牧点安装了太阳能照明设备、地面卫星电视接收设备，购置、发放了新的帐篷、撮罗子、床、被褥、简易木桌、木凳、简易图书柜、简易急救药箱；制作了民族服装等日常生产、生活用品，解决了山上猎民用电、通讯、看电视、取暖等难题。驯鹿业与旅游业的发展状况：2005年投入资金重点建设了敖鲁古雅使鹿部落景区，当年有3户猎民承包户每户就得到纯收入6000余元。2007年又建了6个具有北欧风情特点的‘斜仁柱’群。2010年顺利实施‘家庭游’扶贫项目，为62户鄂温克猎民提升家庭游硬件设施，配备了液晶电视、沙发、床、被褥等物品，接待能力大幅度提高；同时为每户猎民定做了民族服装；62户鄂温克猎民硬件设施已具备接待能力，猎民的思想发生很大变化，有了经济意识。2012年敖乡家庭游累计接待游客1570人，实现收入17万元，在开展家庭游中最少的收入为5000元；依托民族文化，开发敖乡旅游纪念品。引导猎民树立以创业带动就业新观念，鼓励鄂温克猎民成立了民族手工艺坊，由鄂温克猎民中的传统手工业者带动其他鄂温克猎民开发制作旅游纪念品，鄂温克猎民积极性非常高，现已开发出多种民族特色的饰品，实现了猎民自主创业的新格局。2009年敖鲁古雅使鹿部落鄂温克人加入国际驯鹿养殖者协会会员，使我们根河市的驯鹿文化走向世界，成为我市亮丽的名片。”（古新军2013）同时，该项调研还指出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培养和选拔使鹿鄂温克族人才问题；驯鹿的饲养面临的现状与困难，其中包括驯鹿急需加快引种改良，提纯复壮，因搬迁猎枪后收回猎民的人身安全和驯鹿安全受到威胁；搬迁后猎民的收益和放弃猎枪的补助待遇等问题。自搬迁实施后，鄂温克猎民结束了狩猎的历史，随之的各种待遇也消失，鄂温克猎民实施禁猎后没有任何的禁猎补助和补贴，曾经年满18周岁以上男性猎民享受的每年432元护林员工资在2003年搬迁后停发，但是鄂温克猎民仍承担着义务护林员，发现火情及时扑救或报告，而在放养驯鹿方面猎民获益是微乎其微的，虽然驯鹿价值很高，每只驯鹿能销售到万元以上，但是不能仅靠出售驯鹿换取暂时的经济利益，那么根河的驯鹿特色将会加快消失（古新军2013）。驯鹿圈养失败，驯鹿和猎民重归山林。然而搬迁计划中禁猎、猎枪上交以及护林员工资停发等条文已经落实，与后来发生的驯鹿和一些饲养驯鹿的猎民重归山林构成矛盾。好在其中有些进行了恢复，如护林员工资。隐约令人不

安的是，出售驯鹿即不惜血本获得收入支付生活开支的情况还是有了。这无疑直接指向如何拓展使鹿群体收入渠道、从而保证驯鹿数量维持在相对平稳状态的严重问题。

毋庸置疑，历经十余年文化调整、适应，使鹿社会基本进入平稳、有序。搬迁、特别是搬迁之后很快出现的驯鹿圈养失败、重归山林，以及禁猎、一部分猎民失业、贫穷化，的确引起一定的社会动荡。“如今的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相结合的、养鹿与旅游相结合的林海新乡。尤其是旅游事业的发展，民族乡所在地已经成为展现森林游猎文化和驯鹿文化的景区。这不仅给民族乡注入了生机和活力，也是根河市对外开放吸引游客的一大亮点。”（吴守贵 2008：416）搬迁之后伴随政府倡导、推动，与全国形势一样，到 2008 年前后旅游业兴起并日渐繁荣。旅游业以及传统文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卓有成效的开展，驯鹿文化前所未有地走向国内其他地区、走向世界。这成为搬迁以来由前几年的迷茫、不适，逐渐转向民族自豪感提升以及对外部世界的积极适应和参与。

地理、区位因素一定程度影响一个社区的兴衰。可以设想，如果没有 2003 年的搬迁，位于激流河畔、距离根河市北 200 多公里外幽静、世外桃源般的老敖乡，或许会晚一些发生上述变故。同样困扰人们的是，传统与现代化似乎总难实现人们理想化的兼顾和周全，尤其对文化异质性程度不高群体而言，如使鹿群体遇到的驯鹿问题。搬迁后人们感受到的生活条件改善、出行方便以及距离城市近等诸多可畅想的现代化美好生活，难以掩盖及避免搬迁之后很快便发生的驯鹿不适应圈养、在圈养试验尚未成功即草率圈养的失误。“……驯鹿本来就是森林里随苔觅食的半驯养式鹿科动物，以‘生态移民’为由，不顾驯鹿的采食条件和生存环境，试图实行舍饲圈养，急于结束世居山林里游迁动荡的生活，多数猎民被动员赶着驯鹿下山了，也有少数猎民仍留在森林里没有下山。……不久因圈内没有苔藓饲喂，驯鹿又不愿意吃其他饲料，也不愿意喝有异味的自来水和井水，驯鹿在圈内开始饥渴倒毙死亡，也有部分驯鹿冲出鹿圈跑进山里逃命了。而猎民们不能坐视驯鹿在圈内死掉，赶着生存的驯鹿重新返回山林里随苔觅食了。”（吴守贵 2008：416）曾几何时，面对变迁过程及搬迁之后很快出现的驯鹿圈养失败，以此为导火索，围绕该不该搬、搬迁地点该选在哪里，驯鹿的前景、房屋的分配议题，引发各界高度关注。议论骤起——问题、原因、对策——建议，比较集中的议题、观点为：“搬迁之前，敖乡猎民的居住格局是山上——山下二元结构。山

上，靠打猎和山下经常送来的给养生活，猎获的猎物不仅能满足山上山下居民的生活需要，还能带来可观的收入，而山下的定居地拥有乡政府、学校、商店、银行、医院、敬老院、邮电局等为猎民服务的各类设施，定居地的环境优美宜人，相对封闭，是猎民自由自在的乐土。”（涂建军 2009：305）这里显示出与上述关于搬迁原因困境不一致，显示出对老敖乡生态环境恶化、社区衰落等实际不甚明了。还有一些研究也显示出这类情况。这很难避免，如果一些研究做的是搬迁后的研究，对老敖乡状况没有实地调查获得的感受和资料，缺少第一手资料，凭想象或借助有限的资料、或他人有选择的现象描述进行分析。老敖乡——“定居地的环境优美宜人，相对封闭，是猎民自由自在的乐土”，从切合猎民传统心理考虑，这一点应该是真实的。从搬迁后猎民社会普遍呈现的对老敖乡的怀念、回访，反映了猎民对新敖乡环境、新生活内容的多重不适、困惑、痛苦。一直到 2008 年旅游业兴起、繁荣，似乎淡化了一些这种情绪。仿佛经历了一场成年礼。“搬迁后，鄂温克猎民每月每人可以领到 100 元低保，另外，为解决猎民就业，根河市政府划拨给敖乡 38 个‘4050 工程’的就业岗位，每月每个岗位 200 元工资。除此之外，承包驯鹿的猎民指望靠驯鹿茸生产带来部分收入。这与搬迁之前猎民打猎收入比，有一定差距。尤其考虑到搬迁前后猎民开销的差异，我们发现，确实如猎民自己所说，生活水平并没有提高反而下降了。搬迁之前，猎民们在敖乡取暖、做饭烧火都不用花钱，他们用的是老式的火炕和铁炉，烧的是从周围山林里扛回来的木头劈成的板子；老敖乡的土地面积相对敖乡新村大，猎民家属自己种点菜园就省了买菜的钱。”（涂建军 2009：305）据了解，驯鹿圈养失败后，猎民带驯鹿重返山林，绝大多数回到搬迁之前的驯鹿生活的空间，也有的猎民点、驯鹿活动空间南移^①。这意味着驯鹿习惯的气温、寒冷程度以及植被、苔藓状况，离城市近也意味着林子里活动的人多。总之，也有研究指出这方面的问题。“因为根河市郊附近山林里驯鹿喜食的苔藓少，而且套害严重，因此搬迁之后，猎民的驯鹿损失严重，鹿茸质量和数量都明显下降。”（涂建军 2009：305）猎民们说：“当初政府说要驯鹿圈养，我们才搬下来的，现在可好，圈养不成，又让我们上山过苦日子；这边山上驯鹿也没有吃的，都饿死了，我们靠什么生活？早知道这样，还不如不搬呢！”（谢元

① 笔者 2016 年 7 月 1 日电话采访敖乡某猎民。另据讲：今年敖乡旅游业不太好，来的人少了。旅游业能否一直兴盛下去，也同样是问题。而这与猎民生活、感受、生计关系密切。

媛 2006)“我们到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调查时,乡长卜伶生说:‘生态移民前一个猎民每年有万元的打猎收入,可是被生态移民以后把猎枪收了,打猎收入就没有了。此外,驯鹿在森林里放牧,要受到狼、熊等野生动物的侵害,没有枪的猎民可能会出现保护不好自己驯鹿的情况,甚至有时可能自己的生命还要受到野兽的威胁。’(涂建军 2009: 306)“……移民后的新问题,就是驯鹿放养问题,事实上没有解决。距离新敖乡最近的驯鹿放牧点也有 80 公里,远的要 200 多公里。而且过去在老敖乡放养驯鹿,由于历史上形成的先有敖鲁古雅乡,后建立了林业局,民间自觉遵守先来后到的原则,林业部门采取了宽容、包含猎民在林业管理区域内放养驯鹿的态度和做法;但是现在移民到一个完全新的环境,政府各个部门之间如果不能相互配合,不仅会使政府支付很高的协调成本,还将直接影响移民的效果。”(祁惠君 2008: 355)事实上,就森林——土地资源利用权利,20 个世纪 60 年代国家森林资源开发,森林纳入各个林业局施业区,或事实上森林以及生长有森林的土地利用权利在属于国家框架之下具体由各个林业部门管理。也就是说,使鹿群体没有现代法律意义的自然资源利用权力和权利,只是在自然权力——森林最早的居民、民间关系原则——先来后到道德维护之下,延续着传统的狩猎、驯鹿生活方式。问题是,一旦构成这种温情脉脉关系条件发生变化,如国家实行“天保工程”,林业集团推行林业保护承包到更小的单位,甚至个人、家庭情况下,以往那种不太涉及个人、小集团利益的狩猎、驯鹿饲养与森林资源、林中资源利用关系,就会动摇。而没有制度、法律保障的森林使用权力的猎民,自然会遭遇被驱赶、驯鹿无家可归、猎民在林中寸步难行的生存危机。目前,传统游猎地域中汗玛地区开辟为自然保护区。猎民在那里,会避免与林业局资源利用的冲突。类似自然资源利用这种公共问题,应该由国家从宏观制度层面进行设计,出台有利于多元文化和谐共生的自然资源利用法律和政策。

搬迁后的收入、生活收支状况,以及作为使鹿文化核心的驯鹿业何去何从,引发学界广泛关注。“2007 年 6 月,我们民族研究所几位因为其他课题到根河市及敖鲁古雅调研时,根河市宣传部部长主持召开了有关鄂温克族使鹿部落发展方面的研讨会,有根河市人大、政协及各有关单位的人员参加。多数人员提出:猎民野外饲养驯鹿和林业部门的矛盾也在逐渐升级。过去猎民们放养驯鹿的森林中,新中国成立后成立了满归、阿龙山、金河、得耳布尔、甘河等林业局。在实行‘天然林保护工程’前,林业部门和猎民间

的关系还比较和谐，再一个是猎民手里有枪，他们也要避让三分。生态移民后，猎民手里没有枪了，国家林业企业部门开始承包和管理整个森林地带，不让猎民到山上放驯鹿。”（涂建军 2009：306）“驯鹿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第一，传统而粗放型的经营管理模式严重影响着驯鹿业市场的发展；第二，……由于驯鹿鄂温克人青壮年劳动力的不断减少，以及驯鹿业经济中出现的严重断代现象，使驯鹿业生产中高职能的饲养管理工作处于后继无人的状态。多年来，在山林中的牧场上，从事驯鹿业生产的人员数量一直呈现下降趋势。”（朝克等 2006：200）“驯鹿业生产中出现劳动力不足现象，严重地制约着该地区驯鹿业发展。这主要是，跟山林的牧场里饲养驯鹿者非正常死亡率较高，而且多为中青年男性生产力有关。……再加上，山林中的传统驯鹿业生产，以及与此相关的山林单调生活等，也都一定程度地影响着山下的驯鹿鄂温克青年到山林里从事驯鹿生产和兴趣和热情。”（朝克等 2006：200）“尤其是，自从实行驯鹿鄂温克人定居以及免费受教育之后，他们的子女便离开山上的牧场和父母，在山下定居区的学校住校读书。由于在学校学汉文，用汉语交流，所以在校的驯鹿鄂温克青少年使用本民族语言的功能急剧下降，特别是儿童汉化现象非常严重，这自然使他们对于传统驯鹿业生产的知识及技能越来越陌生，进而造成了上下两代人间无可弥补的来自文化知识以及价值观、心理状态、生活习俗等方面的严重差异。”（朝克等 2006：200）

综合上述不难发现，2003 年 8 月近半个多世纪来使鹿鄂温克搬迁是第三次搬迁行动，引起的社会文化变迁堪称巨大，注定应该成为使鹿鄂温克历史中浓墨重彩的一页。而历史正在进行之中。一直到目前，尽管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当地推动、旅游业热潮兴起，然而，驯鹿数量、体质和未来前景，依然最为牵动当地政府和猎民的神经，也是举国和世界感兴趣的焦点。驯鹿业的未来和命运问题，并没有因其他事业的兴起、兴旺而淡化、消减。在相当长的时期，驯鹿业的兴衰，依然事关使鹿群体生计、社会有序和稳定。

使鹿鄂温克近半个多世纪围绕搬迁展开的生活以及这种生活的变化，是以“搬迁”作为其文化维持、演化的枢纽，“搬迁”是作为文化演化的中心环节、关键事件的。其间涉及搬迁原因，即更多来自外部力量引起的搬迁，而更多非孤岛时代纯粹的“逐水草而居”等原初意义的狩猎、使鹿文化与自然环境关系，而更多渗入了这种异质性程度比较低、传统生计维持对自然条件更为依赖、更容易受人文环境变化影响的族群在当代更多发生的与人、社

会等人文因素的互动与协调。敖乡搬迁、社会文化演化历史经验，就帮助我们探寻世界范围内使鹿群体以至于人口较少民族当代繁荣发展之路而言不无启示。

参考文献

朝克等

2006 驯鹿鄂温克现状调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编印.
丁铭等

2022 守护大兴安岭“北极秘境”.

古新军

2013 关于敖鲁古雅鄂温克族猎民生产生活与驯鹿状况的调研报告——2013 年
7 月 22 日在市第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上.

孔繁志

2002 敖鲁古雅鄂温克人的文化变迁.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孟和

2010 使用驯鹿的鄂温克人.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祁惠君

2008 传统与现代：鄂温克族牧民的生活.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涂荣

1995 民族工作是一项长期而重要的工作.述说鄂温克.乌热尔图编著.呼和浩
特：远方出版社.

涂建军

2009 鄂温克族社会文化变迁调查报告.田野中的求索——达斡尔族鄂温克族
鄂伦春族调查与研究.毅松主编.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吴守贵

2008 鄂温克族社会历史.北京：民族出版社.

谢元媛

2006 敖鲁古雅鄂温克猎民生态移民后的状况调查——边缘少数民族群的发展道
路调查.民族问题研究 4.

卓利格图

1995 我的回忆.述说鄂温克.乌热尔图编著.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

卓利格图

2004 草原之子——卓利格图回忆录.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Relocation: the Hub of Cultural Evolution — The Way of Life of Reindeer Ewenki in the Recent Half Century

He Qun

Abstract: The main difference between hunter-gatherer culture and peasant culture is that the former does not necessarily have fixed residences. One characteristic of the way of living of members of a hunter-gatherer culture is mobility. The experience of several large-scale resettlements and attempts to settle by groups of the reindeer Ewenki, a group in the northwest of the Great Khingan Mountains traditionally engaged in hunting,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ago, has shown that resettlement was initiated by external forces. The significance and scale of the resettlement went beyond the obvious consequences. In other words, resettlement has changed from regular interactions with natural phenomena such as climate and topography, but also animals and plants, to increasing dependency on interactions with social factors.

Key words: relocation; hub; cultural evolution; Reindeer Ewenki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冰洋研究.第七辑/曲枫主编.—上海:上海
三联书店,2024.2

ISBN 978-7-5426-8347-2

I. ①北… II. ①曲… III. ①北冰洋-区域-丛刊
IV. ①D5-55

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2024)第 001819 号

北冰洋研究(第七辑)

主 编 / 曲 枫

责任编辑 / 郑秀艳

装帧设计 / 一本好书

监 制 / 姚 军

责任校对 / 王凌霄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41)中国上海市静安区威海路 755 号 30 楼

邮 箱 / sdxsanlian@sina.com

联系电话 / 编辑部: 021-22895517

发行部: 021-22895559

印 刷 / 上海惠敦印务科技有限公司

版 次 / 2024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2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10mm×1000mm 1/16

字 数 / 350 千字

印 张 / 21

书 号 / ISBN 978-7-5426-8347-2/D·616

定 价 / 88.00 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63779028